

# 体育与竞争性

杨忠伟, 赵国炳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竞争性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 竞争意指双方或多方在规则限定下追求卓越、永争第一的努力拼争, 源自对日常生活中竞争现象的模仿。竞争性基础地位决定了体育的规则性和娱乐性, 并赋予体育道德规训、经济赢利、政治宣教的3种外在功能, 从而提供了体育异化的可能性, 当辅之以某些外部条件时, 体育就会异化。竞争性对体育具有全面性的影响, 在体育诸多本质属性中处于显要位置。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体育属性; 体育竞争性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1)04-0007-07

## Sport and competitiveness

YANG Zhong-wei, ZHAO Guo-b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Competitiveness is one of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port. Competition refers to the rivalry between two or more opponents for being excellent or No. 1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rules, originating from the imitation of phenomena of competition in daily life. The fundamental status of competitiveness has decided the rule and entertai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 and given sport such 3 extrinsic functions as to discipline ethically, to profit economically and to promote politically, thus provided a possibility for sports dissimulation - sport will dissimilate when certain external conditions are furnished. Competitiveness has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n sport, an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any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port.

**Key words:** sport sociology; sports attribute; sports competitiveness

体育是游戏, 竞争性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竞争是双方或多方在规则限定下追求卓越、永争第一的努力拼争, 对立或竞争既可能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 也可以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而体育竞争性的外在形式则完全来自于对人类实际的日常生活中竞争现象的模仿, 一个体育场就是一个小社会, 荣辱得失, 兴衰成败每天都在上演。竞争性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构成体育的内涵, 并渗透辐射体育的外延, 更重要的是竞争性还对体育其他本质属性, 如规则性和娱乐性具有基础的决定影响, 也赋予了体育在道德、经济、政治等面向的功能, 提供了体育异化的可能性。因此, 深入探究体育与竞争性的关系, 对理解体育的本质和人文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 1 竞争性与规则性

游戏和体育是有规则的活动。体育参与者的一切行为都将遵循某些口口相传的非正式的或成文的正式规则, 这些规则不仅规定着游戏本身如何开始、如何进行、如何结束, 更限定了个人在游戏中的行为举止。赫伊津哈<sup>[1]</sup>说: “游戏创造秩序, 游戏就是秩序。游戏给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带来一种暂时、有局限的完美。游戏要求一种绝对而至上的秩序。即使最小的偏离也会‘糟蹋游戏’, 剥夺其特征, 使之失去一切价值……实际上, 规则一旦打破, 整个的游戏世界就崩溃了。”而 Suits<sup>[2]</sup>对游戏的定义则尤其强调了规则对游戏的意义: “参加游戏就是从事一项只能利用特定规则所允许的手段参与的具有特别事态的活动, 在这项活动中, 参加者所能利用的手段或方法被各项规则

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此一限定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保证这一活动能够进行。”显然,赫伊津哈与 Suits 都认为,规则是游戏的前提和保证,规则使游戏成为游戏,规则破碎,游戏将毁灭。

体育规则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一种是前提性规则,体育是在以生产为目的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娱乐性的非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中间的“插曲”和“暂时断裂”,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专门创制一个时空情境,因此,就需要前提规则来限定它的时间、地点和进行方式;第二种是过程性规则,用于限定参与者的场上言行,这里所探究的主要即是过程性规则。细察“规则”和“竞争”的关系,不难得出,“规则”是附属于“竞争”的,即因为有了竞争所以才需要规则。英文“compete”(竞争)源于拉丁文 con petire,意为“to seek together”(一起追求)<sup>[373]</sup>,多个个体或集体共同追求某一相对稀缺的资源,必然会形成契约和规则,意在控制行为和调节关系,否则,竞技场将可能沦为“动物世界”。梯利<sup>[4]</sup>说:“道德是个人利益冲突的产物……如果人们在生活中毫无冲突的话,也就不需要任何道德规范了。”体育规则的诞生过程与人类文明秩序的产生过程的轨迹是一致的。中国先哲荀子对“礼”所做出的理性解释,可谓一语道破“规则”本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先有“欲”而后有“礼”,先有“竞争”然后有“规则”,而“礼”说到底就是一系列日常的伦理规范,没有规则便不成其为社会,没有规则也没有体育,体育伦理学就是伦理学。因此,体育的竞争性对规则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 2 竞争性与娱乐性

游戏和体育的人是快乐的,即它们是娱乐性活动。赫伊津哈<sup>[19, 21]</sup>说:“游戏也可能是多余的。只有在游戏的乐趣成为紧迫的需要时,我们才需要游戏”、“和游戏难分难解的欢乐不仅变为紧张的情绪,而且可以变为兴高采烈的情绪。轻浮和狂喜就是游戏孪生的两极。”也就是说,正是娱乐性使得人们沉醉于游戏,游戏的目的是获得愉快的情绪体验。国际奥委会群体委员会委员安东·吉辛克的一段精彩演讲深刻地揭示了体育的娱乐性蕴涵和意义:“多年来,我们彼此互相告诫,体育就是健康,它对人们的身体和精神是有好处的,对个人和社会也是有益处的。无论怎样,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参与体育运动,虽然我自己很赞同体育

的益处……我的理论是:娱乐是长期从事体育的基础。我不是为健康而吃蔬菜,而是因为我喜欢吃蔬菜;我的孩子不是为了健康而喝牛奶,而是因为他们爱喝牛奶;我妻子和我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骑自行车,而是因为我们喜欢骑自行车;我成功地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员,不是因为我重视体育教育,而是因为我喜欢深入细致地进行训练;我教育学生不要只为了争头衔,因为他们都能自觉地寻找他们的目标;他们不是因为得到头衔而高兴,而是因为完全感受到快乐、寻找到的喜欢的运动。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入手,促进体育运动发展。它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娱乐要素。因为‘感受到快乐是长期坚持体育锻炼的基础’。”<sup>[5]100-101</sup>所以,“体育与娱乐是天然共同体”<sup>[5]75</sup>,娱乐性是游戏和体育最重要的本质属性,游戏和体育改造个体身心、转移社会风气的文化价值主要根源于此,而这也正是作为身体游戏的体育为万众推崇和痴迷的缘由。

那么,体育的娱乐性到底从何而来,或者说体育对大众的内在吸引力是什么,这仍要从竞争性中去寻觅。二战时任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组组长的弗兰克·多恩准将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对战争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尽管战事浪费和不道德,但战事却经常是并且还将是人们一生中所能遭遇到的一种最伟大的经历。所谓和平的安静时期是那么平淡、枯燥、常规和重复。战斗中的冲锋陷阵是那么激动人心,振奋精神。如果说没有伤及皮肉的话就简直是一种乐趣了。当厌烦和功业成为一个国家的苦恼时,人们就将寻找一些理由,在一些地方,以某些办法来制造战争的借口。男人的本性就是好斗,他爱战争就好像爱一个为诱惑他而付出一切美丽的女人一样。正像他基本上憎恨和平时沉闷单调的生活那样……和平时有像一块腥臭的湿尿布或煮白菜那样令人厌恶的味道。”<sup>[6]</sup>在这位将军看来,尽管战争最不道德也最残酷,但其推力却是隐藏在人性中渴望竞争、追求刺激的需求。这段话也可以解释那些激烈的身体对抗性体育项目的广泛传播和深受推崇,例如足球、篮球、橄榄球、拳击等等。挪威北极探险家、科学家南森于1926年一次关于“冒险”的演讲中谈及人类对挑战的需要时说:“征服艰难险阻、发现隐秘事物、穿越陌生区域(即未知世界)是我们永远的渴求。渴望探索未知领域的动力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心灵,正是它促动了第一位探险者进入新的领域,它也许是我们那些最伟大的行动的主要推动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类思想之翼的自由翱翔。”<sup>[7]</sup>在南森看来,征服“陌生”的好奇心和渴望战胜困难的竞争心理深植于人性深处,探险于此获得解释,登山、攀岩、冲浪等其他与自然障碍竞斗的体育项目亦可由此来理

解。

赫伊津哈<sup>[152]</sup>、<sup>[54]</sup>指出：“在群体游戏中，对立的成分变成对抗的成分时，由于企盼结果而产生的紧张情绪和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了”，又说：“‘有风险’这句话包含着游戏的本质。”可见，先有竞争，后有成败不定的悬念和紧张刺激的心理体验。超然于单调、保守、乏味、平淡的日常生活，以身体竞争的形式满足人们对卓越和刺激的渴求，是体育的内在吸引力，也是体育娱乐性的源泉，并构成体育成为一种超越历史和民族的文化活动的内在理据。体育作为虚拟化和形式化的游戏性身体竞争，相比日常生活中或许伤及身体的战争和决斗，以更安全的形式使人们在短时间内高强度、高密度地享受刺激和追求卓越，体育的娱乐性孳乳于此，这也是人们热衷体育竞赛的主要动因和体育的最大魅力所在，郑也夫<sup>[9]</sup>在解释人们参与游戏的动机时就认为游戏其实产生于对刺激和炫耀的追求。而观赏体育竞赛实质则是观众对场上队员心理变化和体验的移植与通感，即观众仿佛就是自己在场上比赛，因而随着比赛的起伏而心生波澜。体育是力量与智慧的竞争，有竞争就有输赢、有成败，由此便产生了不确定性，比赛过程的精彩纷呈，比赛结果的扑朔迷离，使得体育不仅吸引了大量直接参与者，也让追求刺激的普罗大众趋之若鹜，Fans现象也蔚为壮观。社会学家戈夫曼说：“仅只结果的不确定性并不足以完全吸引游戏者投入游戏中……一个成功的游戏必须将被许可的展示与结果的悬念结合起来。游戏给予游戏者机会去展示那些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有价值的特性，例如灵巧、力量、知识、智力、勇气和自控能力。”<sup>[9]</sup>因此，竞争性提供了人们彼此竞斗力量与智慧、炫耀运动能力和技巧的机缘，满足了人们对卓越和刺激的心理需求，从而基础地决定了体育的娱乐性，进而对体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3 竞争性体育的功能

功能是在具体情境下应人的需求而产生，事物的属性内在决定了其功能，但只有内在属性却不能使所有功能全部表现出来，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有的是显性的，有的则是隐性的，全赖具体的需要而定。功能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也是变迁的，归根结底是由事物的内在属性和外在环境所决定的。竞争性是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构成内在根据，而各种不同的需要和文化背景则形成外在条件，同样的内在根据与不同的外在条件相结合从而显现不同的功能，竞争性先在地赋予了体育道德规训、经济赢利、政治宣教的功能，而这3种功能也成为体育宿命性的蕴涵。

#### 1) 道德规训。

竞争就是人我冲突，竞争与规则相伴生，一如在日常生活中，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成功者必须是一个在循规蹈矩的前提下获致成功的人，那些靠违法越轨取胜者则会被谴责并受到社会惩罚。体育道德精神的核心是平等竞争与规则意识，赫伊津哈<sup>[156]</sup>指出：“游戏的本质是遵守规则，也就是公平竞争。”Alex C Michalos<sup>[10]</sup>认为：“足球世界与日常世界有如下的区别：(1)只要一队已射门得分，就必须将球权交给另一队，这就给了另一队得分的机会。这不同于日常世界的贪婪。(2)不同于日常世界中人们都去追逐别人的财资，足球中的目的仅是为了获得比对方更多的分数。(3)足球是在一个由裁判和观众注视下的开放环境中进行的，越大的比赛越是被全面地监控，而在真实生活中，越大的事件越是发生在桌子下面、关着的门后面、黑暗的角落里。(4)在足球比赛中，个人或团体平等竞赛，场外因素例如金钱并不能影响比赛。(5)足球比赛中很难伪装和作假，影像技术的发展加强了这一事实，而在日常世界中，伪装乃是一种生活之道。由此，足球这一游戏与日常生活的游戏相比，具有非真实性和道德优越性。”体育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体育展现了在实际生活中所未曾完全实现的道德理想，具体而言，即3个平等：在平等的前提和平等的规则下平等地参与游戏。平等的前提指竞赛双方的基本情况、条件大体一致，如性别、年龄、身高等，体育比赛中的分级别就是典型例子；平等的规则即场上规则是在公正原则下制定的获得广泛认同的规则；平等地游戏，主要指裁判公正裁决。试想，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何曾彻底实现过这3个平等原则呢。或许当今世界，惟有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国家才能不分大小强弱完全平等竞赛。里斯本小组认为，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单纯依赖竞争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例如社会公正、经济效益、政治民主等，应该订立“世界性契约”，以共同协作和团结互助代替竞争霸权<sup>[11]</sup>。体育是人类文明的早熟之果、理想之花，体育先进的伦理价值和公正的制度文明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全球伦理的指针和样板，从而在很长时期内可以成为人类文明在全球化浪潮中进步的灯塔。

体育的道德精神落实到个体竞赛者方面，主要表现为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和对手，将其与日常生活相对应，即是遵守道德和法律、服从法律判决、尊重他人，无疑地，这对于培养现代社会基本公民素养极具参考性和有效性。人们给予体育的道德面向高度评价，加缪(Albert Camus)说：“我所学到的有关道德的一切，都来自于体育。”<sup>[12]</sup>正如维加雷洛<sup>[13]</sup>所指出的：“体育

建立起一种道德观,从而赋予娱乐合法的身份。它改变了运动的面貌,使其成为一种纯洁的理想计划。它还创造了一种(精神),一种竞赛和对抗的方式——人人机遇平等,裁判严格公正,尊重对手,行为纯正。体育一下变成了至高无上的运动,一下自立为榜样,甚至去追求舍己利人的目标。”既然体育如此“纯洁”、“至高无上”,那么体育场成为高扬道德理想主义的另一场域也便顺理成章。道德家以竞技场为现实生活外的另一个规训处所,或者说他们根本不认为竞技场可以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所以道德戒律一以贯之,Graham·Mcfee<sup>[14]</sup>就把体育称为“一个道德的实验室”。孔子曾在礼射中教化人们习礼,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sup>[15]</sup>宋之大儒司马光高度评价传统游戏“投壶”的道德教育意义,认为其能教人以“中正”,故而“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观人。”<sup>[16]</sup>埃利亚斯研究了古今体育在规则方面的重要差异后提出“体育化”这个新词,意在强调体育的“文明进程”;肯尼思·席尔德在《西方“文明化”进程中的拳击面面观》一文中对“体育化”做了如下阐释:“埃利亚斯运用‘体育化’一词,指的是一个进程。在此进程中,体育比赛的一整套规则——包括为参赛各方提供公正、公平比赛取胜机会的规则——日趋严格。这些规则更精细、更明晰,对不同的比赛更有针对性,对比赛规则的执行遵守也监控得更有效。此外,也是在此同一进程中,随着在比赛中高度的激烈对抗与理性保护以免伤害两者之间平衡的建立,自我控制与自我约束也达到了新的水准。”<sup>[17]</sup>埃氏的“体育化”包括两个面向,一是规则的愈加细密和完善;二是个体对规则的“内化”亦持续深入。显然,“体育化”的过程类似于文明规范及其影响人心世道的历程,而道德家对体育的道德规训主要就是利用体育规则对竞技场上众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并培养内心的道德自觉,由“他律”达致“自律”。因此,在体育中,个体也即身体并非完全自由无忌,一系列不断发展完善的游戏规则对个体和身体进行分解、解构和塑造、建构。参与体育需要基本的身体技能,因之,前期准备性训练也是体育活动必需的部分,此种训练即为分解和解构,鲍尔德温<sup>[18]</sup>说:“体育馆是一种工厂,在这里,新手的身体成为接受重组、刷新和重构的拳击机器。”竞赛中参与者的循规蹈矩可谓塑造与建构,个人及其身体的形态、姿势乃至情绪都深受各种规范的管控和影响,体育比赛中亦存在着福柯<sup>[19]</sup>在医院、军营、工厂甚至整个社会所发现的形塑和改造人体的“政治解剖学”和“权力力学”,而孔子、司马光等道德的体育教育者可以相应称之为“解剖者”与“施力者”。费斯克<sup>[20]</sup>说:

“狂欢节是体育运动的夸张形式”,反过来也可以说,体育运动是被规训化的狂欢。

## 2)经济赢利。

体育的经济赢利功能,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体育本身具有“使用价值”;二是可以自由交换的市场机制。如前所述,体育的“使用价值”也即体育的内在吸引力在于其能够满足人们享受刺激和追求卓越的心理需要,这主要是由竞争性决定的,因之,体育项目的受欢迎程度和全球普及性与其竞争性的强弱是成正相关的,直接身体对抗性项目比起隔网间接身体对抗性项目更受欢迎,例如足球之于排球;而隔网间接身体对抗性项目比之竞争性较弱、表现难美的打分类项目则更为普及,如排球、羽毛球之于体操、跳水,当然这只是基于目前全球化背景下体育项目的国际认知度和受欢迎程度的一般观感,而受欢迎程度和普及程度往往与商业价值正相对应。一旦某种事物为一定数量的个体所需要和追求,那么在自由市场中,它就具有了一定的商业开发价值,这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通过为需要者提供这一产品或服务而获取财富。于是,体育的经济功能便产生了,职业体育的从业者无非就是给观众提供一种享受激情与刺激的服务,而今奥运会、世界杯所具有的经济魔力归根结底正是拜体育的竞争性所赐。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施行计划经济体制,任何非政府和私人性质的商业交易活动被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和打压,体育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肩负着强身健体和为国争光的宏大使命,体育从业者属于“事业人”;而随着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加之国门打开,体育的商业化观念和形式方才出现并迅速成长,至今,体育产业蓬勃发展,更是体育学术研究的焦点,愈来愈多的体育从业者也完成了从“事业人”到“商业人”的华丽转身,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体育的传播和普及。

## 3)政治宣传。

体育比赛中参与者之间的个体竞争容易使人联想到他们所属的群体间的竞争,政治对体育的利用主要看重了体育所表现的“力”的象征性。“超越极限,跨越障碍,打破记录,赶超前辈,这种空间形象清晰可辨,体现了战无不胜的前进步伐。在这方面,体育最具有代表性”。<sup>[13][18]</sup>所以体育时常被赋予共同体之间的“战争”意味,小到班级、学校之间的对抗赛,大到国家间比赛,国际赛场上举行颁奖仪式时的升国旗、奏国歌等形式则充分强化了体育竞争的族群区隔。冷战中美苏两大阵营互相敌视,体育场也成了政治角力的一个重要场域,国际体育竞赛与其说是两国运动员身体技术的竞赛,不如说是他们所代表的两种社会制

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赢还是输也不仅仅是个人的竞赛纪录和荣誉，更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谁更优越的问题，彼时的国际体育比赛可谓是两大阵营“冷战”中短兵相接的“热战”。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体育体制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采取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将这种体育制度实行得最为彻底，短时间内竞技体育达到国际先进水准。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教条式地尊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针，采取严格的政府计划的社会管理模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迟滞甚至倒退，严重损害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认同。然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获得其执政最低限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甘阳<sup>[21]</sup>指出：“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这两大阵营的基本区别，实际就在于：后者主要是靠经济成就(福利国家)来取得社会存续所必需的合理性根据、合法性根据和动机支持根据，而前者则主要是靠‘道德理想教育’(政治化的道德，道德化的政治)来取得这些根据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靠经济成长来巩固执政合理性和合法性，主要通过理想信念教育来维持执政基础，而体育在其中起到了独特和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James Riordan<sup>[22]</sup>认为，共产主义体育模式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建立国家认同，对外则可以获得国际认可和声望。社会主义国家重视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内在逻辑有两点：一是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取胜，尤其是击败西方发达国家，赢取奥运会金牌，诸如此类的体育成就也是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以此来强化民众的认同感，取得政权维系的合理根据；二是既然能在竞技场上赢得金牌，那么，在其他“赛场”(如经济、政治、文化等)上，同样可以夺魁，这样一种对美好未来的默认可和期许显然有助于教育民众信赖、认可主导意识形态和政府。因此，具有特别的象征意蕴和宣教价值的体育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特别的关爱和重视，体育的这一特性仍然是由竞争性所引发的对不同群体的区隔性和辨别性制约和决定的。事实上，其他一些国际竞争性赛事也有类似的由此及彼的象征性，只不过其国际影响力不及体育而受重视程度也相应较低而已。

#### 4 竞争性 with 体育的异化

马克思<sup>[23][82-91]</sup>认为劳动本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然而在私有制的生产体系下，劳动成为工人为了维持肉体生存而被迫的强制性选择，从而成为外在于生命的活动，“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

反对他自身的活动”，此时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而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异化劳动”则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活动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可见，异化就是异己和外化，一个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主体反被附属于它或者由它产生的物体所分割、支配、敌对的现象即异化。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引入体育研究，人作为独立主体，体育为其创造的物体，当体育独立于人并支配人甚至伤害人的时候，即可称之为“异化体育”。作为游戏的体育是自由自愿的以身心娱乐为目的的生命活动，非直接生产性和以自身为目的的过程取向使得它远离日常生活的食色需求，因此表现出感性和随性的特点，显然，体育与马克思认为的理想劳动一样，皆是“自由的生命表现”。然而，在“异化体育”的情境下，体育与其“应然”的致力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宗旨乖舛，甚至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如前文所述，竞争性赋予体育道德规训、经济赢利、政治宣教3种外在于原初旨趣的功能，当人们将这3种功能置于体育本体性的原初功能和宗旨之上时，体育则必然沦为实现体育之外的目的、满足体育之外的需求的工具和手段，彼时体育的异化和边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体育参与者的异化和边缘化。因之，竞争性对体育的异化所扮演的角色不宜简单化约为直接责任者，但也并非完全无关涉，可以说竞争性为体育异化提供的可能性与一定的外部条件(如主导者实用主义的体育价值观)相结合促成了体育异化的现实性。

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sup>[24]</sup>的社会，道德礼法无时无处不在引导规范着上至天子下到庶民的生活，游戏和体育自是不能例外，程大力<sup>[16]</sup>研究了传统体育中的道德化倾向后指出：“我们把伦理化作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一大特征强调提出……是因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伦理化倾向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仅是伦理思想影响着体育，能使竞技者建立良好的竞技道德，能提高竞技者的心理素质等等，而是体育甚至已被作为一种培养人遵从礼仪、修身养性，培育高尚道德情操的手段，在被施行或被提倡。”将体育作为一种道德训教的手段，甚至将体育的价值主要归之于此，体育实际上已被“工具化”，丧失自性而只是为他人做嫁衣，那么，仅只作为道德教育手段的体育并非唯一，也便是随时可以被取代和丢弃的，此即为体育的异化：“自我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他人的活动，生命过程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的力量、异己的人所有。”<sup>[23][98]</sup>埃利亚斯对体育规则的古今比较研究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规则对体育

本身及其参与者的重要影响与意义,行为先于规则,任何规则都是为限制而来,因此规则极有可能牵制和拘束参与者,而当这种牵制和拘束超过本该的必要而走向过度时,审视并检讨规则对体育的影响就成为事关体育解放身体、追求自由的核心人文价值是否全面铺展践履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晚近体育及其组织商业化以来,国际体育组织制定体育规则所要考量的早已不仅仅是大众的道德观感,还有或许更为紧要的商业利益,那么此时的规则对体育本身的影响也就愈加复杂,从而愈加需要审慎对待。显然,此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但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记取尼采这句片面却极深刻的警句:“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sup>[25]</sup>唯利是图的商业逻辑对体育人文价值的侵蚀众所周知,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当素来以华丽的脚法和流畅的进攻著称的荷兰队在主教练范马尔韦克带领下,采取相对保守但却失去传统的战术赢得比赛时,荷兰足球记者抨击球队的足球不好看,太功利,对于这样的观点,范马尔韦克毫不客气的给予回击:“这是世界杯的比赛,不是游戏,是比赛,赢得比赛,比踢漂亮的足球更重要。巴萨踢的好看,但他们在欧冠比赛输给了国米,西班牙队也输给了瑞士队。”<sup>[26]</sup>在沉重的荣誉和巨额的奖金压力下,游戏“不再是游戏”,过程不再重要,在比分上比对手多那么一两点才更值得追求,国际足球一直以来关于“漂亮足球”还是“丑陋足球”的争论本质上是娱乐、游戏和实用、功利的冲突。前东德为了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高度重视竞技体育,竟由政府机构组织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最终虽然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但在政治操弄的虚华成就下面,却是体育精神的荡然无存和对运动员身心的极大损害,体育工具化、政治化的害处无过于此,“举国体制”下服用兴奋剂的国家行为书写了体育史上的耻辱一页<sup>[27]</sup>。中国前国家田径队总教练黄健深对跳高名将朱建华成名后的生活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九八四年,朱建华再破世界纪录,他成为中国体育界头号新闻人物,许多报刊都把他这一跳视为‘中华崛起’的象征。你非让一个二十岁的小青年背上‘中华’的重任,把跳高同一个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他精神上增加的只能是负担……随着朱建华走向巅峰,许多事情都分散着他的精力,一个又一个单位来请朱建华去做‘振兴中华’之类的报告。他文化水平不高,他没有人们希望得到的深刻思想,这实在难为他了……我常想,马拉多纳名气那么大,他只是心一意地踢球,没有人让他去承担崛起阿根廷的义务,我们何必让运动员活得那么累呢?”<sup>[28]</sup>朱建华的遭遇或许也正是众多中国著名运动员曾经或正在经历

的,在一个贫弱已久的民族国家,国强民富自然是全国一致的期盼,体育的拼搏、勇敢等等奋斗精神,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夺冠时“升国旗、奏国歌”的扬眉吐气,这些体育现象的象征意义显然可以满足人们的爱国情感需求。然而,任何对体育的看重和关爱,都不应忘记对体育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尊重,因为体育本身就是为人的身心和谐而存在并发展的,事实上,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煌煌重任都是体育所不能承受之重。

体育的竞争性赋予体育在道德、经济、政治3个方面的实用性和“工具化”的内在可能性,当辅之以适当的条件,就可能滑向异化,从而根本上改变体育原初的文化功能,体育未能带来自由、愉悦与健康,反而给人以束缚、痛苦和伤害,也就是说本是“解毒剂”却被毒化,打个或许不恰当比喻,小姐的身子却做了丫鬟,菜刀未被用来切菜却用来杀人,都非其本意,这是无论体育的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者都需认真关注和肃慎对待的大问题,它关涉体育还是不是体育的中心命题。美国心理学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sup>[37]</sup>将人在生活和休闲活动中获得的一种“最佳体验”名之为“畅爽”,畅爽体验是一种心理感觉,“在一个有明确目标、有规则约束,并且能够让人清楚地知道如何做得更好的行为系统中,当一个人的技能足以充分应对随时到来的挑战时,就会产生这种感觉。此时,注意力高度集中,无暇顾及与此无关的事,也不会担忧别的问题。自我意识消失,时间感也模糊了。能产生这种体验的活动是如此地让人陶醉,以至于人们自愿去做这件事,只是因为它本身,而非其他外部理由,他们也不考虑做这件事会得到什么,甚至有困难、有危险也不在乎。”由此可见,将体育用作手段,带着体育本身之外的目的去从事体育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若有所思、忧心忡忡、缩手缩脚、身体僵硬的游戏者,身心并未全部投入体育活动中,充其量也只是半个游戏者,自然也不会获得“最佳体验”的畅爽感觉,甚至是相反的消极情绪体验,这对体育和游戏者双方都是无益的双输情态。体育的宗旨是服务于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因此,对体育最好的“实用主义”和“功利”就是让体育是体育,游戏是游戏,如何在体育中享受畅爽体验才是体育效能最大化的关键,也是每个游戏者应该全力追求的。

竞争是体育的外在表现形式,源自对日常生活中竞争现象的模仿,体育的各种规则也便是体育场上的“道德”和“法律”;竞争性为人们追求卓越和享受刺激创设了虚拟的争斗情境,体育的娱乐性正是孳乳于

此。由此, 竞争性赋予体育道德规训和经济赢利的功能, 竞争性所带来的胜败优劣的区隔性使得体育被政治集团用来宣示实力和教育国民。在此基础上, 竞争性提供了体育异化的可能性, 而当我们抱持实用主义的体育观将这3种外在功能视为体育的究竟价值时, 体育将走向实质的异化, 背离原初致力于人身心和谐发展的宗旨而走向其反面。可见, 竞争性对体育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和影响, 因此在体育诸多本质属性中处于显要和关键的位置, 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研究中, 我们都应给予其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 参考文献:

- [1] 赫伊津哈. 游戏的人: 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 [2] Bernard Suits. What is a game?[G]//Ellen W G, William J M. Sport and the body:a philosophical symposium. Philadelphia: LEA&FEBIGER, 1979: 11-17.
- [3]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M]. New York:Harper Collins, 2008.
- [4] 梯利. 伦理学导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76.
- [5] 胡小明. 体育休闲论[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 [6] 余戈. 1944: 松山战役笔记[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421.
- [7] Gunnar Breivik.The quest for excitement and the safe society[G]//Mike McNamee.Philosophy, risk and adventure spor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0-24.
- [8] 郑也夫.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74.
- [9] John W Loy J R. The nature of sport :a definitional effort[G]//Ellen W G, William J M. Sport and the body: a philosophical symposium. Philadelphia: LEA&FEBIGER, 1979: 38-47.
- [10] Alex C Michalos. The unreality and moral superiority of football[J].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1976, 3(9): 22-24.
- [11] 里斯本小组. 竞争的极限: 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156-202.
- [12] James W K. Sportsmanship as a Moral Category[G]//Ellen W G, William J M. Sport and the body: a philosophical symposium. Philadelphia: LEA&FEBIGER, 1979: 264-271.
- [13] 维加雷洛. 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一个神话的诞生[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14] Graham McFee. Sport rules and values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sport[M]. London: Routledge, 2004: 129.
- [15]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5.
- [16] 程大力. 体育文化历史论稿[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104-125.
- [17] 沙红兵. 文明化·体育化·净化[J]. 读书, 2008(8): 114-122.
- [18] 阿雷恩·鲍尔德温. 文化研究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08.
- [19]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156.
- [20]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00.
- [21] 甘阳. 古今中西之争[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126.
- [22] James Riordan.The impact of communism on sport[G]//James Riordan, Arnd Kruger.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po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E&FN Spon, 1999: 48-66.
- [23]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24]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0.
- [25] 周国平. 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8: 115.
- [26] 搜狐体育. 直击荷主帅发布会发飙 巴萨踢得好看不也输了! [EB/OL]. <http://2010.sohu.com/20100619/n272919867.shtml>, 2010-06-19.
- [27] 卢元镇, 马廉祯. 辉煌背后的阴影——东德体育教训之一[J]. 体育文化导刊, 2005(6): 51-53.
- [28] 翟学伟. 中国人的脸面观——社会心理学的一项本土研究[M].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 1985: 121.